

第一编

中共梁山地方组织的 创建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2 年至 1937 年 7 月)

第一章

中共梁山地方组织创立的背景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便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武装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手段，使中国丧失了完整的独立主权，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使封建主义势力在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中国仍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又是一个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还造成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和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基础。从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以后，代表这两个阶级利益的各派军阀官僚势力，是帝国主义者控制和宰割中国的代理人。这些反动统治势力既然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就只能依靠武力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但它们从来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是因为它们所依附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互相争夺的缘故。它们也不可能使中国的社会政治有什么进步。对于任

何企图按照人民的意愿促进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改良方案，都只能遭到它们的拒绝。国民党政权是旧中国这种统治势力的最后一个。它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它的内部始终是四分五裂、争斗频繁的。国民党的主要部分虽然不得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仍然是受英美帝国主义指使的反动势力。

这种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衰弱的根源 是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富强。只有用武装革命的方法推翻这种反动统治，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中国摆脱黑暗的深渊，走向光明的前景。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改变祖国的苦难命运，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英勇顽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

第一节 梁山一带的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沿革

梁山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历史悠久，行政区划沿革多变。史载，这里自上古时代就散布着华夏民族先

人——东夷族的原始部落。据对县境内青堎堆、贾堎堆遗址的挖掘与考查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先人就在这里耕种稼穡，烧制陶器。秦置郡县后，这一带分属东郡范县和薛郡须昌县。以后历代变易，至民国时期，梁山一带成为寿张、阳谷、东阿、东平、郓城、汶上等六县的结合部。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在这里辟建昆山县。当时昆山县的辖区是现梁山县境内的北部、中部、东部一带。现境内的南部属郓城、汶上县，西部属郓城、寿张县。1949年8月下旬根据上级指示中共昆山县委、县政府在商老庄召开区乡干部大会，宣布昆山县易名为梁山县。1949年10月以后梁山县委、县政府驻地自梁山县黑虎庙一带迁至水泊梁山脚下的后集村一带。1985年，根据山东省政府行政区划意见，将梁山北部的戴庙、昆山等8个乡镇划归泰安市东平县辖管。境内大部是平原，有梁山、凤凰山、龟山等几座山丘，以梁山最高海拔197.9米。黄河自西北过境，境内长25公里，梁济运河贯穿南北，境内长48公里；东北部濒临东平湖。山湖相映，两河纵横，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

第二节 梁山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水泊梁山英雄豪杰辈出，义举侠风长存。北宋时期，宋江等聚义梁山，杀富济贫，以

36 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演绎描写的就是这些英雄的故事。由于他们的顽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宋江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继他之后，渔民张荣率领的起义军又重上梁山，杀贪官，除污吏，英勇抗击金兵入侵，一时名噪大江南北。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北宋被金所灭。而后金兵多次南侵，途经梁山泊，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张荣为抗击金兵，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组织渔民 300 余人，一战梁山泊，再战鬲潭湖（在今江苏省淮安境内）、三战缩头湖，转战千里，战绩斐然。曾被南宋朝廷授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之职。他们的抗金斗争在已故著名中国史学家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史书中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嘉靖年间，梁山脚下法兴寺住持僧西竺禅师受命率 3000 僧兵开赴胶东，组成抗倭义军，多次击退前来骚扰的倭寇，立下赫赫战功。现存嘉靖四十四年立下的西竺禅师墓塔前的碑文，详细地记载了他的英雄事迹。明朝末年，在梁山一带还发生了徐鸿儒、侯敬、朱鹤山、李青山等领导的反抗封建主义的农民起义。崇祯十四年（公元 1641 年）梁山一带发生特大旱灾，百姓无衣无食，生存难以维持。当时全国农民起义的形势不断高涨，李自成的起义军在河南“均田免粮”，又杀死了福王朱常洵。山东的农民起义也此起彼

伏。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李青山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青山（今梁山县寿张集乡人）高举“迎闯王不纳粮”的大旗，率军驰骋中原，抗官军、劫漕运，屡攻兖州及附近州县，连战皆胜，震撼山东。

清朝咸丰年间，嘉祥县满家碛胡家庄人胡四，不满清朝的统治，又久闻水泊梁山贯出英雄，便奔赴梁山，结交了当时著名的英雄人物青埂堆人王君可（绰号王大刀）、后集村的马声彦、馆里村的王明固、潘家庄的潘寿、黑虎庙村的高建成等人，共同议定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10月27日在寿张集以西的徐楼玉皇阁举行起义，当时响应者近3000人。胡四和王君可、马声彦领导的义军在梁山一带大力宣传清王朝的腐败与罪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队伍迅速发展到了十万之众，并划运河为界，与河东僧格林沁所率的清军对峙达3年之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胡四于二月初四夜兵分两路，主动出战：一路由靳口（今梁山县馆驿镇），一路由戴庙（今东平县戴庙镇）渡过运河，杀死了清军副都统、钦差大臣伊兴阿和河东民团团团长何厚堪，并消灭东阿县令及其部下官兵千余名。乘胜包围了东平城里的清军达十数天之久。义军威震四方，周围的百姓纷纷奔聚梁山。当时逃难的百姓只要投奔胡四，胡四均力加保护。不久，聚的人多了，胡四就派兵帮助建房筑寨，梁山周围很快建成有围寨的村庄20多个，现围寨旧址尚存。

咸丰十一年冬，胡四义军被清官军包围在济宁以

北。胡四为掩护部队转移，主动殿后，终因寡不敌众被俘，被押往济宁后凌迟而死。胡四殉难后，义军公推王君可、马声彦为大头领和二头领，发誓要为胡四报仇雪恨。同治四年初（公元 1865 年）捻军首领张宗禹率部进入鲁西南曹州、单县、鄆城一带，寻机与僧军作战。捻军总首领张宗禹、赖文光等亲至梁山与王君可、马声彦共商伏击僧格林沁之大计，捻军与梁山义军形成共同抗击官军的强大阵容。

僧格林沁是蒙古科尔沁亲王（清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后裔。此人强勇善战，嗜杀成性。他受当时主持军政事务的大臣奕訢之命，率三万骑兵亲来山东剿灭捻军。捻军诱敌深入，在曹州以北地带设下埋伏，僧格林沁率三百名铁骑亲兵奋力向外冲杀，无奈捻军越战越勇，僧格林沁几次突围不成，精疲力竭，被捻军砍下了脑袋。曹州大捷之后，梁山捻军的装备更加精良，士气益盛。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梁山及其周围 13 个州县的农民曾联合起义，反抗军阀张宗昌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但这些斗争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直到 30 年代，这里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人民的革命斗争才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第三节 抗日战争前梁山一带的社会状况

一、政治状况

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特别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间，山东更换了十几任督军和省长，梁山一带的地方官员也更迭频繁。直、皖、奉系军阀部队在这一带来我往。尤其是，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有梁山籍的奉系军阀曾出任直隶督办兼省长，褚玉璞，直隶省军务公署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等人。他们不但争权逐鹿于北洋派系之间，危害国家和民族，而且拉拢勾结本籍地方官僚政客、土豪劣绅，作威作福，祸及乡里。

由于梁山一带特殊区域位置和复杂的地理形势，历代政权都对这里控制不力，梁山周围匪患猖獗，匪兵合污，有的土匪投靠反动政府，充当汉奸。在梁山周围活动的土匪，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只有少数外地投奔来的。梁山附近大多数村庄都有土匪，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他们不管行人还是客商，只要有利可图，便不择手段地进行抢劫。梁山一带成为“雁过拔毛”之地。从军阀混战到日伪时期，一些兵痞、流氓、无赖相继为匪，他们既要人钱，又要人命，连尸体也卖钱，奸淫抢掠，无恶不作。

广大群众不但遭受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 还要遭受盗匪的袭击，再加上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 农民、渔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经济状况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梁山一带的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以农业为主 渔业、商业、手工业经济都很薄弱。梁山一带的农耕历史，始于七千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自大汶口文化时期，火耕农业逐渐为耜耕农业取代，至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形成以锄耕农业为主。此后，农业生产虽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干扰，但仍在缓慢发展。到清末民初，适应境内自然条件的旱地耕作制度也已形成。历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统治 都以农业为国本 曾经采取了一些劝农、促农的政策和措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封建阶级的残酷统治和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长期维持，使广大农民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和束缚。梁山一带地势低洼，历史上就是一个水、旱、蝗灾频繁发生的地区。京杭大运河在梁山东部纵贯南北，连接内河多路水系。县境西部又处黄河堤防“豆腐腰”险段的下部 黄河漫溃之水多积于此 并由此一汇南清河入淮，一注北清河入海。加之临界河湖的泛滥危及 梁山一带一直是较重的洪泛区。唐、宋时期 黄河经

濮、范一带注北入海，濮、范及其以上河段的频繁决口，大多危及梁山东北部。从公元 858 年至 1194 年的 330 余年里，就危及梁山一带 26 次。从明代至 1855 年，因黄河改道南移，走豫、皖、苏入淮，黄患危及梁山较少。1855 年至 1937 年，河况有变，82 年内危及梁山周围的水患 14 次，菏泽至梁山段决口 45 处。给梁山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梁山一带农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清末，主要粮食作物亩产仅有 82 斤。1936 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 95 斤，是民国时期单产最高的一年。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破产沦为佃农或贫雇农，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民国时期，占全县人口不足 8% 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总土地面积的 30% 以上，而占全县人口 50% 以上的贫雇农却只占不足 30% 的土地。广大贫苦农民一直处于少地或无地的境况之中。在土地的封建占有和封建剥削关系下，农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营方式和剥削手段。在土地经营方面，地主主要靠雇工或租佃经营，富农为半雇工半自耕经营，中农为自耕经营，而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贫苦农民则主要靠给地主富农当雇工或租佃土地维持生计。伴随上述经营方式而来的是雇工、土地出租、放高利贷等多种剥削方式。雇工中长年受雇的

为长工，季节性或临时性受雇的为季节工或短工。他们受地主富农雇用，靠付出大量的劳动而获取菲薄的收入，所创造的价值半数以上为雇主占有。地主出租土地方式有包租制、分租制、定租制，收租种类有实物租和货币租。不论哪种方式，总是地主得大头，佃户得小头。佃户劳作一年，往往交上租子所剩无几，遇到歉年，交不上租子就会债台高筑。封建剥削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放债，俗称高利贷。穷人每遇天灾人祸，青黄不接，缺粮断炊，无以纳租，只得向地主借债。借粮借款，利率往往高达 100% 以上，到期不还，还要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广大贫苦农民除遭受上述种种剥削外，有的还“卖青苗”，即为了活命急需粮食糊口，忍痛把生长在田里尚未成熟的庄稼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地主，庄稼成熟后由买主收获。有的甚至于“指田押借”，即在借贷无门或无力还债的情况下，把一定数量的自有耕地或房屋，指划给债权人，任由债权人使用或出租，到约期无力赎回的，由债权人以少量粮食买死，或卖给他人以偿还其债。这种封建的社会生产关系严重束缚和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生产水平的长期低下，农业经济的长期落后和停滞不前。在封建阶级的重重盘剥之下，广大贫苦农民如牛负重，不得温饱，一遇天灾人祸，许多人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人饿树遭殃，叶子捋个光。旧坟土未干，新幡又插上。”农民头上三把刀，地主剥皮租子高，官府欺压田赋重，苛捐杂税如牛毛。农民面前一条

路 逼上梁山举枪刀 ” 这些民谣 就是旧社会穷苦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梁山一带的工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明清时期，仅有少数个体小手工业者，从事打铁（制造一些斧、刀、镰、锄、铁铤、犁、耙等）酿造（酿酒、酱油、醋等）建材、印染、造纸、木器、竹业、泥陶、烧砖、纺织、缝纫、编织等小规模作坊生产。产品以供应当地需求为主，自产自销，且多为季节性生产，时产时停。只有少数较大的作坊保持常年生产。梁山西部杨营、黑虎庙、小路口一带，农村妇女手工织制的土花布（今称鲁锦）条纹清晰，色泽浓艳，图案精美，为传统地方名产，远销肥城、东平、平阴、长清一带。

清末及民国期间，梁山一带的商业也不发达。只有寿张集、后集、黑虎庙、拳铺几处较大集镇，老运河沿岸的开河、袁口、靳口等村，因交通便利，私营商业比较集中，有粮行、酱菜店、糕点铺、饭馆、酒馆、茶馆、盐店、旅店、铁匠铺、银匠铺、染坊、剃头铺等。随着老运河断流和逐渐废航，运河两岸的开河、袁口、靳口等有名的集镇，也没有了明、清时期的繁荣。只有一部分山西客商，往返于天津、济南、济宁、徐州等地，在沿运河集镇形成一批规模很小的商品物资集散地。一般村庄有串乡叫卖的小商小贩。1944年统计，全县共有私营商业行业20个，3248户，从业人员5939人，资金120万元，年经营额604万元。

民国时期 梁山一些当铺、钱庄 分别承揽典当、放帐等借贷业务。民国十四年（公元 1925 年）袁口“广全号”当铺开张，股东刘文茂，其后台系汶上县县长白坡东，有一万块钱元的资本。民国十五年（公元 1926 年），寿张县人洪德普在戴庙村开设当铺，有 500 块钱元的资本，后转由郭玉峰经营。其经营方式：受押物品成交后付以当票 质押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不等 过期不赎 当铺即没收其质押物品。质押放款额，在质押品价值的五成以下 利息三至五分。民国九年（公元 1920 年），山西人任士敬在袁口开设“益盛号”钱庄。其后 直隶督军褚玉璞投资 分别在方庙、辛兴屯、后集开办钱庄。至 1937 年，梁山一带共有大小钱庄 32 处 规模较大的是大安山的“恒泰号”放帐兼营粮行 有 1 万块钱元的资本 雇用店员 10 人。钱庄放款 最长期限为一年 月息四分 最短期限五天，月息五至十分。抗日战争时期，钱庄逐渐减少 至解放战争时期 相继关闭。

1840 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独立的封建财政随之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政。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间，北洋政府数次颁行法令，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厘定国家与地方收支范围。梁山一带县级政务费由省拨付，县地方性开支，则依赖地方各种附加。田赋附加和其他杂捐杂税，既无标准又无限制，致使地方官吏营私舞弊有隙可乘。1921 年以后 政局越发混乱 军阀各自为政 乱摊乱敛 财政支离

破碎 百姓苦不堪言。张宗昌督鲁后 更是变本加厉 横征暴敛，民怨沸腾。1925 年苛捐杂税增至几十种，仅军事特捐一项每两亩赋银即加征 2.2 元。1927 年 竟预征三年田赋，人民恨之入骨。韩复榘主鲁后，县境内田赋征收每两亩即增至 4 元，附加银增至 2.8 元 比张宗昌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如牛负重，残喘度日。

三、文化教育和思想状况

梁山一带是孔孟之乡 自汉武帝“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孔孟之道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 以孔孟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延续了两千余年。孔孟之乡的封建教育自然尤为发达。1840 年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封建教育日趋衰落。

晚清时期，县境内较大的村镇都设有私塾，比较有名的是后集、安山、青堦堆、寿张集、戴庙、靳口、开河、拳铺、大营、吕山口、管庄、齐岗、土山、黑虎庙、野猪淖、庄垓、辛兴屯等私塾。每处学生少则几人、十几人 多则三四十人。私塾分为四类 学塾 三五家、七八家或十几家 合资聘请塾师，按学生年龄、程度和家境交纳学资；家塾 绅商大户 自请塾师 学馆 塾师自设 自收学童、学金 义塾 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资举办 学童免费上学。私塾学童无定额，年龄不限，学习内容无统一规定。由于封建政府长期采用科举取仕，用以引诱笼

络读书人 培养统治工具 致使各类私塾都把读《经》讲《书》修习制帖诗八股文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把应付科举考试作为主要教学目标。清末民初时期，禁办私塾，提倡办新式学堂。1905 年 清政府明令废除科举 兴办新式学堂。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止。1906 年 清政府颁布的‘上谕’中明确提出：“学堂以中学为主 西学为辅 培养通才 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实’诸端定其趋向。”这一教育宗旨仍明显地反映了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性质。但是，由于当时广大群众传统观念较强，对这种‘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教育十分冷淡 新式学堂发展缓慢，乡村中私塾教育仍很盛行。1911 年以后 梁山一带始设学堂，多为绅民捐助建校，或以祠庙改为学堂，入学人数甚少，设施也很简陋。始建于 1911 年的兴林学堂，在梁山一带是比较有名的。校址设在后集村西，今梁山县政府机关驻地。1913 年，改名为国民初级学堂。学堂经费从梁山周围的村庄和义地收入中开支。1914 年，扩办为寿张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开始招收高小生，少部分经费由官方拨款，大部分由地方自筹。初办时三年一届，后改为两年一届。梁山一带当时另一所声望较高的乡村学校是现馆驿镇田大店高级小学。学校始建于 1923 年 初建时在校学生 139 人 名为东平县第三高级小学。后来有不少共产党人利用任教作掩护，在校内外开展革命活动，播撒革命火种，使该校成为革命

的摇篮。1930年，寿张集高级小学（今梁山县寿张集乡）成立，招收学生140人。1931年，梁山东南部靳口高级小学建立，招收学生135人。

清朝末年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梁山一带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文化思想在该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新式学校中《社会》、《公民》及《三民主义》等课程的开设，直接地传播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观、民主观和政治主张，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批判孔学、提倡科学，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反对独裁专制，反对迷信盲从，更是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一潮流通过文化教育的媒介波及梁山一带，给当地的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注入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但是，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所追求的还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仍不能给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根本性的影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在梁山一带的文化教育界引起巨大震动和反响。